

儒

李氏基金儒商文丛
潘亚暾 主编

儒商学

潘亚暾 汪义生 等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李氏基金儒商文丛
潘亚瞰 主编

儒商学

潘亚瞰 汪义生等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商学/潘亚瞰 汪义生等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11

(李氏基金儒商文丛)

ISBN 7-81029-464-4

I. 儒…

II. 潘…汪…

III. 文化理论

IV. GO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 石牌)

新华书店经销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排版

广东省农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 字数: 25 万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8.80 元

绪 论

天佑中华！

我灾难深重、历尽坎坷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技昌盛，教育发展，国防巩固，生活改善，言路大开，内外交流频繁，观念更新，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举国上下衷心拥护。

值此社会剧烈的震荡、转型期，神州大地也出现了似乎难以理解的种种现象：沉渣泛起，新孽丛生，官商勾结，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道德滑坡……其实，这类现象，任何一个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恐怕都难以避免。幸而，国人对此初步达成了共识：倒退、收缩是找不到出路的，唯一正确的治本之道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完善、规范市场经济法制的同时，提倡道德自律，加强自我修养、完善个人品德、提升精神境界、提高文化品位。儒商学这门新学科的提出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窃以为，一切理论无不来源于实践，其是否站得住脚，亦须由实践检验。众所周知，经济是基础，社会历史发展的轴心在于经济。实践证明，只有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方能奏效。经济与文化二者形成合力，促进二者的一体化，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

神文明；既出经济效益，又出社会效益；既要索取，又要奉献，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这就是我们提出建立儒商学的基本点和落脚点。

温故而知新，历史的经验耐人寻味，值得吸取。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利用身处开放前沿的地利优势，率先推介和研究台港、海外华文文学，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时，极左影响远未消除，善良的人们余悸未消，为我们捏一把汗，纷纷劝阻勿重蹈覆辙；而居心叵测者，则施以恫吓、批判、声讨。

我们认定目标，既不听劝，也不怕吓，我行我素，一往无前，经过历时 18 年的奋搏，终成大气候：推出专著百多部，论文上万篇，编写教材，在百多所高校开课授业，召开了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联系的文友遍布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繁荣发展。如今，在全国范围已拥有上千人的研究队伍，成立了无数研究机构，内外交流极为频繁，成果辉煌；在华人世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充分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对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事实说明，有志者事竟成。然万事起头难，拓荒者必须胆、识、才、能兼具，人、文、言、行一致，方能负起披荆斩棘的艰巨使命。而到事业有成时，还需有“功成身退”的雅量和气度。让后来人跨越自己。因为，只有让千千万万后起之秀踩着自己的肩膀上，才能再铸辉煌，更上层楼。因此，奉献精神尤为可贵，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事业至上者，才有擎旗开路的资格和能耐。

在研究台港、海外华文文学过程中，南洋儒商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日常交往中接触到大量的儒商作家，阅读了不少儒商作品。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系统地探讨儒商文化现象，研究经文合力论，并在1984年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提出16字诀：“亦商亦文，以商养文，商发文兴，商文并茂”，以及“以文会友，走向世界”等口号。不料，遭到部分与会者的非议，说什么此非学者之言、教授之论，并赠我“潘大吹”的外号，后来又给我派发了鼓吹“铜臭文学”、“口号文学”等帽子。对于生活道路曲折、曾饱受磨难的我来说，这号小帽子比起我过去戴惯的那些骇人的大黑帽来简直不值一晒。我自然毫不介意，一笑置之，继续昼夜钻研不息，大发妙论，简直一发而不可收了，公开发表了《经文结合》、《科文联姻》、《三军（学军、商军、俗军）并起，光我中华》、《文学四化》（即“严肃文学通俗化，通俗文学高雅化；现实主义现代化，现代文学务实化”）、《为儒商正名》、《文商角色反串》、《我为儒商文学鼓与呼》、《商文结合，相得益彰》、《儒商现象》、《儒商异军突起》、《儒商文学方兴未艾》、《儒商正是艳阳天》、《儒商是精英一族》、《儒商不奸》、《“出书热”是种好现象》、《儒商之歌》、《三教九流儒最重商》、《双才作家香飘云外》、《梁凤仪现象是儒商现象》、《儒商文学一枝花》、《当代儒商是经济现代化的旗帜》、《儒商论》、《南洋儒商文化》、《南洋儒商及儒商文学初论》、《盛世出儒商》、《儒学对海华企业文化的影响》，等等不下百篇，还评论了百家儒商作家作品，终于赢得同情、支持和赞扬，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

与此同时，笔者通过教学、出访与会、出国讲学等机会，大力宣传儒商和儒商文学，几乎逢会必讲，逢人必谈，言必称儒

商，成了儒商研究“发烧友”，感染了不少同道和合作者，开始产生凝聚力和影响力。总之，经过十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努力，在世界大串连中，获得共识者的掌声、同情者的帮助、支持者的喝采和前辈们的鼓励（如香港文坛翘楚以倡导纯文学的《香港文学》月刊社长总编刘以鬯先生近年来一再发表报导国际儒商学会活动、儒商作家和有关儒商文章）。

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与主观上的努力和客观上的情势是分不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浪潮滚滚而来，出现了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的“下海热”和“出国热”，出现了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出现了官商、奸商、盲（没有文化谓之“盲”）商、俗商，也涌现了一批儒商。道德与商贸产生了矛盾，法制与世俗发生了冲突，传统与现代出现了碰撞……可谓矛盾百出，尖锐激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相协调，以致有人否定改革开放，怀疑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惊呼西风惨烈、道德沦丧、传统荡然无存。在此风雨交加的情势下，清醒的论者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群魔乱舞所吓倒，加快步伐往前冲，牢牢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坦然地迎接海内外恶势力的挑战。

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国，在长期闭关锁国之后，一朝推行改革开放，要想一帆风顺、平安无事，只能是一种奢望。渴望先富起来的人们有重物质、轻文化的倾向并不奇怪，奉献久了的人们想索取，也不难理解，在工资水准很低的干部中出现贪污现象更是难以避免的。简而言之，一些不好的东西伴随着改革开放潮流冒了出来，以致一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而导致社会混乱，都是正常的，无需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大乱正可大治，大力倡

导、推行传统现代化、经文一体化，两个文明一起抓，早日实现社会管理法制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商精神应运而兴——以义制利，以利助义，利义并举，造福社会。发扬儒商精神就在于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既创造物质财富，又提高人的素质。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表彰拼搏精神、奉献精神 and 爱国主义精神，就是批评不法官商、奸商和盲商，就是宣传“大我”、“大勇”、“大智”、“大信”、“大义”、“大公”，建立优雅廉洁的社会，就是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以利港澳回归，两岸统一、民族团结之大业。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们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化的层面来构思，并从美学的、心理学的、组织行为学的、道德伦理的、环保的、文学的、教育的等角度来加以阐述，力求使本书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构架，一定广度、深度、力度和高度。

二

儒与商结合，历代都有，只是形式、内容和规模不尽相同而已。今天，我们推出这部“儒商学”书稿，旨在抛砖引玉，集四方贤俊的智慧，探幽索微，使这门多种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建设日臻完善。

“儒商”这一名词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呢？窃以为，这得先明确“儒”与“商”的现代理解问题。

据文献资料判断，“儒”在孔子逝世以前的语义发展线索为：（跟巫祝同流的）术士——（统治者豢养的）家庭教师——（知书识礼的）文人。看来，“儒”字原来并无什么特别光彩的涵义。

“儒”似乎还是良莠不齐的，所以孔子告诫要做“君子派的儒”，而不可做“小人派的儒”。孔子在世时，并无特别尊重儒士的记录。刘邦比孔子晚出生 295 年，他曾不客气地脱下儒生的帽子当场朝里撒尿。早先的儒何曾就香呢？

然而，风水轮流转，儒的身价沉浮不止，构成了中国通史的一个侧面形象。考察古今之儒商，可以看到弱强转型的现象。糯米一蒸就软，儒生多数是一整就服服帖帖的。古时“儒”字还带有“懦弱”的涵义，古今都有“文弱书生”之语，即可说明。至大至刚的强儒在历史上犹如凤毛麟角，而柔道混世的弱儒倒是子孙亿万。从春秋后期的小人儒到当今的君子儒，呈现由弱转强的趋势。由古代的弱儒到当今的强儒，这是历史的发扬光大。儒商的“儒”，堪称中华历史孕育的精英一族。既然史籍屡见“儒官”、“儒吏”、“儒将”、“儒医”，那么，根据其所作所为，推出“儒商”这样一个新名词，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再看“商”。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产生商品交流的需求。自用有余，势必转贩，于是商品顺时产生，商人应运而生，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君，就开国那一代而言，多经杀人流血才攀登其位，就继统的众代而言，也还是最大的剥削者。孟子游说梁襄王时曾如是说：“不嗜杀人者”，才可望统一天下。事实上，战国时期，君王已成为杀人阶级了！历史实在是有欠公道：“把‘君’列为天下之魁首，把‘商’列到‘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位，并且又由君来号召抑商！其实，君与商只属于不同的社会分工，瞎颂蛮抑是没有道理的。商人，是劳动阶层，是产、供、销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中介者，他们脑力、体力“双劳”是守恒的。

历史上第一次最严厉的抑商运动发生于秦孝公时期（公元前356年至随后约20年），抑了民商，却导致了官商萌芽。秦始皇也有抑商的口号，背地里却与牧畜主、矿山主之类的巨富颇通款洽。中国封建经济到隋唐时期臻于顶峰，抑商已是大难事了。北宋年间，政治家王安石以大鸿儒的气魄充当了变法改革的总设计师，他把一些商收归国有。这就产生了“商官”，或许可以说后世的官商就是商官的孳乳。

第二次最严厉、最彻底的全国性抑商运动，发生在本世纪50至70年代的30年间。尽人皆知，记忆犹新，不说也罢。长期以来，没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人们对国有企业屡让国家承担巨额亏损视为天经地义。而在人们头脑中又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私营企业经理是剥削阶级代理人，是庸俗的商人甚至是天生的奸商。笔者认为：“国企”的真正出路在儒商，即罢官商，打奸商，请来儒商。依靠有文化素养、有崇高理想、有道德修养、有现代科技知识、有经营能力、有信誉、有奉献精神 的儒商，“国企”才可望摆脱亏损、再创辉煌。

以上，是给“儒”与“商”作的初步界定，那么儒与商又是怎样结合的呢？在中国历史上，儒乃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地位悬殊，互相瞧不起。在儒士看来，“无奸不商”、“无商不奸”，故耻于言商，耻于为伍。在商人眼里，“文人无行”、“百无一用是书生”，难于融合，无缘高攀。就阶级和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言，儒与商有着天壤之别。在二者结合方面，古代曾出现过一些个案，如子贡、陶朱公和司马相如等著名儒商，明、清之交的徽商也盛极一时。这种结合毕竟只是个别、特殊现象，只是到了

本世纪 40 年代二战结束之后，儒商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盛行于南洋华社。今日儒商出现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先南洋，后中土，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辐射，然后由东方走向西方。中华民族是儒商发祥地，南洋华人社会则是当代儒商的核心地带，当此世纪之交，中国两岸四地儒商风起云涌，展望 21 世纪，将是儒商新世纪！

儒与商两结合何以首先出现在南洋华侨华人身上？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日益衰弱，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门户，国人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租界出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样。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处处有“阿 Q”和“孔乙己”。华族，被西方列入劣等民族。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哀鸿遍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贫民或为求生存冒险闯南洋，或被当作“猪仔”贩卖到世界各地做苦工。离乡背井的华侨华人付出几代人的牺牲，在新土筚路蓝缕开拓创业，终于在本世纪二战后从“猪仔”跃升为“博士”、“富豪”。他们学而优则商、商而富则文。其原动力，是为炎黄子孙争气，其奋斗史的主旋律是爱国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称“华侨为革命之母”。为了振兴中华，华侨在异国他邦学而优则商，走融合之道。他们扬弃儒家文化，吸纳西方文化精华，取长补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奉行“天人合一”、“拿来主义”，以理定法，纳法于仁，以仁统法，讲信用，重道义，追求合理性和高效率。他们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取之社会用于社会，力促文教事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讲道德，遵法规，比贡献，塑立起美好形象。他们依靠聪明才智，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第一时间信息，依靠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团队精神，抓住有利时机，发扬人才优势，走股份化、

集团化、跨国化的康庄大道。他们学贯东西，勇于探索实践，努力推进传统文化现代化，注重企业文化和商业文化建设，提高职工素质，发扬见利思义的传统美德。窃以为，华侨华人儒商属于精英一族，儒商不奸，儒商文化就是精英文化。发扬精英文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精神，能有力地推动社会稳定、繁荣和不断发展。华侨华人走融合之道，既为客观时势所迫，亦是自觉追求的境界，华人儒商在实践中体会到，只有这样，才能既扎根新土，又反馈故园。

三

儒商学是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特点是多种学科的交叉，涵盖经、史、文、哲、教育、伦理、企业管理、商业管理等学科领域，几乎包罗万象，非本人学识所能穷尽。只因走访海外三胞儒商，为其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所感奋，便不自量力，知难而上，希冀通过自己的勤勉，为创建这门有重大意义的新学科作一番前期的拓荒工作。

研究南洋儒商之辉煌业绩，是笔者试图创建这门新学科的基础，也是撰写本书之缘起。我是闽南人，因地缘、史缘、文缘的关系，所认识的儒商大多是闽南语系中人。据调研材料显示，闽南语系（包括闽南、潮汕、海南、港台、东南亚）的富豪，其财力居华人世界之冠，本丛书之一的《儒商列传》足资证明。

90年代初，经首届新加坡作协会长、《星马文学大系》主编李廷辉博士的推荐，新加坡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主席先生赠我一笔专款作为研究、出版和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之经费。李氏基金创始之一李光前先生为南洋著名侨领、陈嘉庚的女婿，他既是我

校（暨南大学）校友，又是我的小同乡（福建南安人）；既是大儒，又是大亨，属于典型的爱国儒商。李氏父子（长子成义、次子成智、三子成伟）两代全是誉满四海的儒商典范。李光前的创业史、奋斗史、发展史，就是一部活的儒商学。无奈，李氏生前立下遗嘱：50年内不准宣传李氏家族的业绩。笔者只好照办，2018年后再出《李光前传》（李氏于1968年逝世，半世纪后便是2018年）。

为了宣传儒商精神、表彰儒商业绩、开展儒商运动，我日夜兼程，赶出了一本《儒商文学论稿》，与我老二（潘小平）一起于1994年7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华裔招商暨儒商文学座谈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等国家领导人及各界名家与会讲话，无不肯定、赞赏和支持我们首倡的儒商研究，并高度评价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次活动上了中央电视台，首都报刊杂志都作了广泛的报导，深得海内外儒商之心，赢得四海各界热烈的喝采。同年7月下旬，笔者父子在中国最大特区海南省首府海口市召开了首届华裔招商会暨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百余位儒商及其研究者与会，会议收到了30多篇论文，成立了国际儒商学会，通过了《国际儒商学会章程》（草案）和《国际儒商学会基金会章程》（草案），选出了国际儒商学会五位常务理事。学会实行秘书长负责制。本人受命出任首届国际儒商学会秘书长，负责儒商基础理论研究和组织建设，并主编“儒商论丛”，在香港建立总部，然后联络各国各地儒商朋友和儒商研究者成立各自的组织。

全球儒商研究组织机构的建设进展迅捷。首届国际儒商文研会后，以本会常务理事云里风（原名陈春德，一身兼任教育家、

作家、企业家，正是典型儒商）为首的马来西亚儒商代表团回吉隆坡后，立即筹组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筹委会，选出以陈春德为主席的理事会。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已于1996年3月正式获准注册，订于1997年4月中旬召开第二届国际儒商文学研讨会。这一喜讯大大鼓舞了当年海口会议的与会者，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儒商研究机构筹建工作都加快了步伐。中国大陆的京、沪、穗三地也在酝酿之中，尤以上海进展最快。在上海，由本会理事汪义生牵线搭桥，获上海中汇金融外汇咨询公司儒商余季方鼎力支持，于1996年4月召开首届上海儒商研讨会，70多位海内外儒商及其研究者应邀与会，收到论文23篇，发言热烈、讨论深入，多种观点相互碰撞，盛况空前。这次研讨会由于有美、日、新、马等国和香港10多位儒商出席并踊跃发言，引人瞩目，反响极大。上海儒商研究会筹委会决定再接再厉，开展一系列儒商研究活动，下一次大型活动是10月间主办首届中国徽商学术研讨会。上海儒商研究会的注册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与此同时，由汪义生牵头选编一套“儒商文丛”。上海的“儒商热”一浪高过一浪，有力地推动了儒商世界大串连，各国各地区纷纷表示将组团出席明春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儒商学会年会。

眼下，各国各地儒商和研究人员正加紧完善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推进国际间的横向联系，以期逐步建立人才、资金、信息网络，创办顾问、投资咨询公司，创办杂志和出版社，跨入21世纪后拟兴办各类儒商学校、学院、研究院以及儒商街、儒商城、推出百部儒商传。预期到2010年，在世界范围内可望形成百万儒商大军，这支高素质、高品味、高风格的儒商队伍，将成

为振兴中华经济的中流砥柱。

这样的乐观预测，并非乌托邦的异想天开，而是有根据的，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有利因素。

第一，这是千载难逢的和平发展时期，在今后的 20 年内，地球的上空看不到世界大战的阴云惨雾。

第二，时势造就英杰，在这相当长的稳定的经济建设时期，正是培养和造就百万儒商的黄金时期。

第三，中国正逐步进入法治社会，随着经济的翻几番，必然带来文教事业大发展，人的素质将大为提高，大踏步迈向优雅的文明社会，综合国力可望跻身于世界最前列，此乃“盛世出儒商”之谓也。

第四，海外华侨华人（儒商）爱国热情高涨（既爱居住国，亦爱祖国），互助互利、互学互补、共进共荣成为时代的主流。

第五，儒商高瞻远瞩，胸襟宽广，有远见卓识，善于发挥中华传统的团队精神，推动大融合、大协作、大联合，促使经文一体化，融中西文化于一炉，使传统文化现代化。世纪之交的世界市场上，儒商将大显身手，一展风采。

久衰必盛。今日中华民族已告别了小生产经济的时代，挣脱了极左路线的羁绊，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传统现代化、社会法制化、经济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转型期，儒商研究，不是一门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问，而是一门经世致用的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实用型学科。窃以为，杂交最优秀，边缘学科最先进，儒商研究应立足在对古今儒商现象深透研究基础之上，着重研究现代儒商所应当具备的精神、素质与能力，通过弘扬儒商精神和儒商风范，以营造良好的商业运作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振奋民族精

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推动全球华族经济的振兴和中华文化的繁荣。

四

本书有 14 章 66 节，20 万字，完全按我的意图构想来写。从总体看来，似已说透了“商”的实质及其类别。我们不怕官商，不避奸商，表扬儒商，立场坚定，准备接受舆论的批评与指正。以促进“儒商”理论的发展。以上粗略交代了“儒商”的提出，“儒商论丛”的缘起，儒商的界定、涵义，以及有关问题。以下是从不同角度对书中各章探讨问题的导引。

（一）中国当代儒商现象探析

汉唐以来屡有表现，然而近 10 来大陆经济蓬勃发展的气势，却是中国历史上所少见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太平盛世的气象，海外华商得到了报效祖国、振兴家乡的机会，纷纷归来，投资献技，不辞辛苦，其拳拳赤子之心，感人肺腑。这一章揭示了儒商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根由。仿广州俗语，可以说儒商是“出口转内销的高档产品”。此话怎么说起？原来近当代中国政治内斗严重，“窝里反”的反复性可怕，致使海外赤子寒心，一时不敢表示回馈家国的善良意向。“文革”十年，中国完全“革”掉了传统文化的“命”，道德灭存，勤劳荡尽，廉耻不关心，浪子逞霸道。有识之士，缄口保身，忧心如焚。改革开放，给我们送回了往年出口的真正中华牌实货！长期只有红卫牌伪劣商品充斥着的鸟笼市场，万花竞放众眼新，好似井底青蛙，跳出来见了世界，欢叫猛跳：原来海外华商跟我们的垄断官商作风大不相同，“毕竟出口转内销的好！”——本文所探析的儒商，是本人多

年前从群商众贾之中，离析出其德行优越者，即有文化教养、有道德品行、有爱国利民精神的商人，称之为“儒商”，并阐扬其新义，以示与古有别——儒商是当代经济现代化的旗帜。所谓盛世出儒商，乃指海外华商近年回归所树立的商场新风，它也带动了大陆原有的开明知识分子商人和商人知识分子。煌煌中华，商场出现了新文化！“士农工商”的历史排行榜改动了，儒商和商儒是电子资讯年代的士商（矛盾对立统一而使士、商结合了！）。“儒”的最广泛理解是书本知识丰富的人，而本人所倡导的儒商之“儒”，则重点放在有社会实践能力的开明知识企业家身上。他们是开放政策的产物。中华文化遗迹，有些境内不存境外存，从日韩汉唐旧音到近代被掠走的文物，事例众多，不堪回首。看来提倡儒商文化，创立儒商学，不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相当深刻的历史意义。凭借《儒商学》这部论著，可以整体上看清了当代儒商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的阶层，是经济建设时期的中流砥柱，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先锋。他们是社会转型期中的活跃角色，促进着境内外人才的交流，并奠定了文艺繁荣的契机。他们在下一世纪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起桥梁和纽带作用，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二）儒商史话

此章意在叙述中华文化承传的沿革脉络，好让读者按迹循踪，自行钻研儒商学的丰富史料，识古明今，深入儒商科学的意蕴，鉴往知来，明扬奥义。但《史话》立意通俗，不求博雅。其于史料繁富之区，则另组专文探讨之，如下举篇章云云。请参阅第二章附录，本人所写的《〈儒商史话〉提要》一文。

（三）徽商简论